

黃黎洲學譜

謝國楨著

黃
黎
洲
學
譜

商務印書館

黃 梨 洲 學 譜

謝國楨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

(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)

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

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

H1017·16

1932年12月初版	開本 787×1092 1/32
1956年5月重印第1版(修訂本)	字數 96,000
1957年10月上海第2次印刷	印數 2,001—3,000
印張 5 1/16 插頁1	定價(7) 零 0.50



黃宗羲 (1610—1695)

修訂本序

我在二十多年前曾寫過一本黃梨洲學譜，不過是平時讀書的劄記，把梨洲的學術思想、生平事蹟和學派的流傳，整理排比，略爲加以分析，談不到立場和觀點。學術思想是不斷地在那裏進步，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科學研究正在突飛猛進地發展着，這部稿子是應該重新另寫的。商務印書館和我的朋友們鼓勵我，認爲在這個基礎上，如果加以修改，還可以適應讀者的需要；並給我提出了不少修改的意見。以我理論水平的低下，和業務的不够充實，當我初步修改完畢之後，感覺到雖然比較舊本有些改正和補充，可是對於梨洲學說的主流和事實的本質還不能闡述出來，這可能是受了舊本體例的拘束；至於其它方面也還有不少缺點，因此在這裏有必要加以說明。

黃梨洲先生是在我國明末的著名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，他抨擊閹黨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，並參加了抗清運動的鬥爭，正確地發揮了進步的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。因此近三百年來，人民羣衆以及比較進步的學者們，將黃梨洲、顧亭林與王船山同列爲『清初三大儒』，由

此可見黃梨洲在當時的地位，以及他的學術品格如何爲後人所推重了。但是梨洲的學術品格爲什麼會符合了人民的期待和要求，而反映了積極的、進步的民主主義思想，這並不是偶然，而是有其歷史根源的。在敘述梨洲學術思想之前，不能不先說一下當時的社會背景。

*

*

*

有明一代，不但恢復了農業生產，而且也發展了長江流域的工商業，蘇州、松江、杭州的絲織業和江西景德鎮的陶磁業，已經由手工業作坊而出現了手工場，並且有了從農民中脫離出來而形成爲獨立的手工業的工人。在蘇松一帶南北商賈的會集，運輸了大批的貨物。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，體現了商業資金的活躍，因之由錢幣而變爲貴金屬的銀，普遍地使用，明代中葉以來經濟的繁榮是可以想見的。○同時我們知道十六七世紀以後，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，階級鬥爭也表現得極其複雜而尖銳，明朝統治階級不僅進行土地的大量兼併，而且對於工商業也盡其剝削的能事。在十七世紀的初期，明萬曆二十年間，『好貨成癖』的萬曆帝一面增加田賦來壓榨老百姓；另一面還以徵收『鑛稅』爲名義，派宦官到處向工商業者進行掠奪，以致激起市民的暴動，這就影響到工商業的發展。到了天啓帝時期，閹黨魏忠賢當政，掌握了用人行政的大權，濫用私人，樹立朋黨。這一羣閹黨是代表北方地主階級的一個集團，他們既獲得政治上的實權，就想盡辦法去剝削老百姓；而且他們看見江南經濟的繁

榮，當然也想要染指，因之就要把江南地主所得到的權利奪取過來，形成爲對他們更有利的局勢。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賢傳上說：『羣兇煽虐，毒痛海內。』形容得是不爲過的。

我們知道以顧憲成、高攀龍和李三才爲首的東林黨，他們雖然是當時的開明紳士，但是代表東南地主階級，而東南的地主階級又兼營絲織的工商業，明萬曆時的閣臣張瀚是出身於絲織業的家庭中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。◎明神宗實錄上說：『東林之漸熾也，……富商大賈之類，如病如狂，走集供奉者，不知其數。』◎可見東林黨是與新進的工商業氣息相關的。從而可知東南的東林黨與北方的閹黨雖同屬於地主階級，但是由於局部利益的衝突而有了摩擦，於是就發生同一階級的內部矛盾。代表東南地主階級的東林黨，他們看見北方的閹黨形勢猖狂，東林黨的前途日形暗淡，不能不起來挽救自己的危機，而企圖改良朝政，排斥閹黨，這是與東南新興的工商業者的利益分不開的，因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東南廣大羣衆的要求，江南城市市民起來支援了東林黨這一運動。所以閹黨爲了要奪取東南的利權，想把東林黨人一網打盡，則不僅是摧殘了東南人士進步的勢力，阻礙了東林經濟的發展，而且扼殺了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。◎

黎洲是出身於這樣的環境中：他的父親黃尊素是東林黨中錚錚的人物，生平見義勇爲，

敢於抨擊時政，而又是一位歷史學家。梨洲從小受到家庭的影響，由他父親督責他研究史學。後來又追隨浙東的大儒——當時的學者稱爲菴山先生的劉宗周研究學問，梨洲在這濃厚的學術氣氛薰陶中，樹立了鑽研哲學思想的基礎，豐富了博通古今的學識，在實踐當中鍛鍊出來：『守正不阿』的高貴品質。當魏忠賢專政的時候，爲了行使其權威，派廠衛的『緹騎』到處去搜捕東林黨人。蘇州的開明紳士周順昌等被閹黨所逮捕，解送到北京去問罪，因之激起了蘇州市民的暴動。⑤梨洲的父親黃尊素也被株連，而犧牲了性命。這時梨洲以十九歲的青年，本來就憤恨這種惡勢力，再加上閹黨與他有殺父之仇，他時時刻刻抱着報仇雪恨的意念。不久天啓帝天逝，崇禎卽位，魏忠賢失去了勢力，明朝政府重新起用東林黨人，梨洲就到北京去，昭雪他父親的冤枉。當明朝政府審問魏黨餘孽的時候，梨洲拿着鐵椎子，當場椎擊魏黨的特務頭子許顯純，使之體無完膚，來消他心中的積恨。這時魏黨的餘孽阮大鍼偷偷跑到南京去，閒住起來，仍想用他那一套諂媚的本領來拉攏人士，並暗地進行挑撥離間的陰謀活動。梨洲就與東林黨的孤兒顧杲和復社人士吳應箕等揭發阮大鍼的罪惡，發表了南都防亂公揭，把阮大鍼輩驅逐出去，使之一時不敢出頭露面。這就表明了梨洲一向懷抱着正義感，不與惡勢力作絲毫的妥協。正由於這種英勇果決的精神，遂奠定了他一生的行動。

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，終屬於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，在崇禎初年，東林黨雖一度抬頭，

企圖走改良政治的道路，來挽救明朝的頹勢，然終敵不過統治階級中其它的惡勢力；東林黨人趙南星等掌握政權，也不過曇花一現，又歸於失敗。由於廣大的人民羣衆受不了明朝統治階級的橫徵暴斂和嚴重的壓迫，在一六二八年爆發了西北農民大起義，給明朝統治者敲起了喪鐘，但猜忌成性的崇禎帝並沒有檢查一下自己，有所省悟。他施行的政策，不過是驅逐了一批閹黨，又換上了一批他所親信張彝憲之流的太監。當外患日亟，清兵將要闖進關門的時候，羣情一致的起來抵禦外侮，展開了抗清運動的高潮，而崇禎帝的願望却與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，爲了想保全其帝位，仍然沿用『攘外必先安內』的卑鄙策略，寧肯向敵人妥協，而不肯放下宰割人民的屠刀。

我們知道當天啓年間，魏忠賢亂政的日子，也正是清兵入侵最緊急的時候，閹黨的爭權奪利，把持朝政，給敵人入侵以有利的條件。從而敵人的間諜滲透到太監羣裏面去，進行陰謀破壞的惡毒計策，排斥抗戰的將士，引用閹黨的私人，以致敵人深入，疆場日壞，使明朝政權越發地腐敗不可收拾，大有朝不保夕的局勢。平常慣於壓迫人民的統治者，官僚地主階級，他們寧肯出賣祖國，投降清朝以保全個人的利益，而不願意和人民羣衆團結在一起，來抵抗共同的敵人，以贖他們以往的罪惡。於是代表大地主階級突出的漢奸吳三桂，當大順農民軍的領袖李自成到達北京的時候，他就勾結清兵入關，進行侵略中國，縮短了清朝入侵的

路程。

清朝統治者便與明朝最腐朽的官僚地主階級勾結起來，進行最兇慘、最瘋狂的侵略大屠殺。④當一六四四年五月北京淪陷之後，在南京建立的弘光王朝，仍然是閹黨餘孽馬士英、阮大鍼把持政權，想與清朝妥協，對內大興黨獄，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，在那裏苟安朝夕。不到一年的功夫，一六四五年四月揚州失守，史可法在那裏壯烈地犧牲了。當時守南京的還有三十萬人之多，他們就不戰而降，漢奸們勾引着清兵南下，大殺大砍，便演成『揚州十日』、『嘉定三屠』血淋淋的悲慘事蹟，給歷史上遺留下深刻的教訓。

儘管腐朽的統治階級昏聩糊塗，卑鄙無恥到這個樣子；但全國人民羣衆已經在那裏怒吼了！西北和東南羣起了抗清的義師，⑤一六四五年清兵攻下蘇杭，要渡過錢塘江的時候，浙江人民也不落後於各地的羣衆，寧波幾個窮秀才，以陸宇燾爲首的『六狂生』，與人民羣衆團結在一起，舉起了抗清的義旗，在錢塘江上大敗清兵，取得不可磨滅的戰績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『畫江之役』。⑥不久大嵐寨主王翊在四明山結寨起兵，對清朝作了堅強的鬥爭。四明山是在明末著名的抗清根據地，抗清的時間相當地長久，一直到一七〇六年（清康熙四十五年）張念一等還奉着朱三太子在那裏起兵抗清，人民羣衆英勇不屈的精神，是多麼偉大的力量呀！這些情況梨洲不但是親眼看見，而且是身與其事的。當『六狂生』和王翊起兵的期

間，黎洲抱有恢復的熱望，到南京去上書論政，但被馬阮輩所嫉忌而遭到逮捕。由南京逃回到浙東，他看見明朝政權的腐朽無能，而又身受到國破家亡的痛苦，指望着官軍的恢復是沒有希望了，這種重大的責任，只有落在自己的雙肩上；便與他的兄弟黃宗炎起兵於餘姚的黃竹浦，參加了人民羣衆抗清的戰爭。由於義師力量的偉大，魯王以海所以能够監國紹興，唐王聿鍵所以能够立國福建，建號隆武。當時唐魯兩方面的情况，雖然不能像弘光時期擁有長江流域廣大的區域，但各地方的義軍已經四起，人民羣衆抗敵的氣氛方興未艾，是有足够的力量，可以作恢復之舉的。但是腐朽的明朝統治者，唐魯兩方面不能互相團結，甚至要同室操戈，就自己削弱了抗戰的力量。因爲明朝統治政權不能利用很好的機會，所以很快地就遭到失敗。一六四六年魯王被清兵所敗，飄泊到舟山沿海一帶，幾乎沒有存身之地；唐王也在汀洲遇難，在浙閩的明朝政權相繼都傾覆了。這時黎洲辭別了老母，拋棄了妻子，離開家鄉，追隨着魯王，在舟山、健跳等地，奔走國事，縝密地計劃，作恢復的運動；但是自錢肅樂、張名振殉國以後，魯王的形勢日形微弱，黃氏兄弟不止一次的奔走於四明山與舟山之間，來挽救這種頹局。黃宗炎幾乎被清兵所殺，清兵並且要逮捕黎洲的老母來要挾黎洲，他只有回到寧波，再想恢復的辦法。黎洲懷抱着一腔熱血，時時刻刻企圖恢復，然而經過十餘年來，永歷帝局促在西南，不久逃奔到緬甸，被清兵所俘；鄭成功率師北伐，圍攻南京，又遭到失

敗。清朝統治政權已經逐漸地穩定，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達到恢復的願望。雖然廣大的人民羣衆仍在那裏與清朝作堅強的鬥爭；但是動搖的知識分子，多半變節投降了敵人；就是稍有氣節的人士也躲藏在巖穴裏，或者當了和尚，甘於淡泊，作消極的抵抗，更顯得士氣消沈了。

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只有像黃梨洲、顧亭林等堅忍不拔前進的人士，他們素來抱有英勇不屈的精神，和洞達時事的遠見，他們不爲滿清的威力所嚇倒，但是也知道，復興民族運動是一個長時期的艱巨工作，於是暫時放下了刀鎗，拾起筆桿來作爲武器，進行民族復興的革命宣傳，通過理論思想的武裝，與清朝統治者作不懈的鬥爭，從而堅定了人民羣衆保衛祖國、解放自己的信心。他執行的方式，是繼承了劉宗周的——蕺山證人講會的辦法。劉氏講學已經停頓了二三十年，梨洲在紹興重新舉辦了證人講會；又在鄞縣、海寧、石門等地，不斷地借着講學，糾合同志，鼓吹進步的思想，發表他的政治主張。寫成他的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偉大著作——明夷待訪錄。他的戰友顧亭林推許這部書說：『百王之敝可以復起，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。』就可以看出這部書的價值了。

講學的期間，他整理有明以來的史料，作爲他論證的根據；又研究宋元以來的學術思想，撰作了一部有系統的學術史，空前的名著——明儒學案。還寫了一部宋元學案，可惜沒有完成。在長時期內，他從事於學術的探討和宣傳進步的思想，既不怕清朝政府的威迫，

又堅決拒絕漢奸們的拉攏、甘言和利誘。最後清朝政府纂修明史，非叫他的兒子黃百家出來不可，作爲要挾的條件。黎洲迫不得已，答應了漢奸徐元文的請求，才能終老田園，完成他畢生的事業。到他的晚年，仍然精勤不懈地選輯有明三百年的文章，編輯了一部明文海，又精選爲明文授讀，教導他的兒子百家；以爲從這個簡編，就可以大致看出明朝文章的發展和演變了。黎洲以八十六歲的高齡，編完了這部書以後，就結束了研究學術的工作和戰鬥的生活。

黎洲雖然休息了，但是他的民主思想和鬥爭的精神，反映到廣大人民羣衆中間，成爲革命的理论基礎。有清三百年來的人民恢復運動，正如馬克思所說：『壓迫者與被壓迫者，始終是處於互相對抗的地位，進行着不斷的、有時是隱藏、有時是公開的鬥爭。』黎洲的學說思想，於有清一代，一直貫串在人民的意志當中；對於後來爆發的辛亥舊民主主義革命，起了積極的、推動的作用。

我們知道凡是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，不是憑空掉下來的，而是有其歷史的根源和社會的背景。正如斯大林同志引馬克思的話教導我們說：『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，恰巧相反，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。』同時人們的思想意識是由於發展漸變而來

的。黎洲的民族恢復的意識，和民主主義的政治主張，也不是靈機一動，偶然出現的，而是由於上面所說的社會背景和黎洲的生平所經歷的事蹟所造成的。黎洲少年時期，也不過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有爲青年，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張也和東林黨人士一樣，僅希望改良明朝的政治，但是時局大變了，環境不同了，在他的客觀實踐中，認識到統治階級的醜惡面貌，他又與人民羣衆在一起，共同獻身於英勇的抗清鬥爭，看見人民的力量偉大。這些事物的存在，使他的思想起了轉變，因而就從唯心論的泥淖中拔出腳來，漸漸地觀察客觀的事實而傾向於唯物主義的思想了。◎凡是思想的轉變，都是由不自覺而到自覺的，這也是思想發展的規律和必然的趨勢。黎洲看見昏庸的統治階級是像上面所述的那樣的腐敗，而人民羣衆英勇的氣概又是這樣的雄壯，尤其是人民抗清的戰爭，被一系列的昏庸的君主掣住了後腿，使偉大的事業功敗於垂成。這樣鮮明的對比，使他體會到君主專制腐朽的本質，因此在明夷待訪錄中指出來：『天下之治亂，不在一姓之興亡，而在萬民之憂樂。』並且憤慨地說：『古者以天下爲主，君爲客，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。今也以君爲主，天下爲客，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，爲君也。……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！』（原君）他提倡廢除君主，主張法治，設立學校，從學校中培養成人民的輿論，所謂『清議』，使人人有言論的自由，來監督政府：『郡縣朔望，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，學官講學，師弟各以疑義相質難……』

郡縣之政事缺失，小則糾繩，大則伐鼓號於衆。」^①（學校）這是與資本主義社會代議士機關有差不多的性質，黎洲在三百年前就提出了這種主張，是極其有進步意義的。

在封建社會末期，農民所受到的最大痛苦，就是土地的大量兼併，顧亭林日知錄上說：『蘇松之田地，十九皆官田也。』同時又加上統治者無情的剝削，『橫徵暴斂』，生活陷於更悲慘的境遇。如明崇禎時的三餉（遼餉、剿餉、練餉）賦役一項，比明朝初年每年二百萬兩的賦稅，增加到一千八九百萬兩^②幾乎多了十倍，人民已經不能負荷這種担負。因之黎洲提出了解決人民生計的問題，輕賦減役的辦法；並針對着當時招募壯丁的弊政，提倡徵兵服役的制度，好避免人民被統治者徵調的痛苦。

同時擺在面前的問題，江南的工商業已經相當的發達，手工廠的工人由農民中脫離出來，農業作物走向了商品化，工商業已經與農業有並駕齊驅的形勢。他排斥了以往『工商爲末』的傳統思想，認爲工商皆本。^③而主張獎勵工商；設立寶鈔庫（開設銀行），統一貨幣，使其『流轉無窮』。並發行本錢，隨時可以兌現鈔票，以便利於『仕官工賈』，講求民富的政策。總之，他提出了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政治主張以及具體施行的辦法，確實反映了我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一般市民的要求。

黎洲研究學術思想，他的出發點也和他的政治思想一樣。

有明一代的學術，在明代初年如薛敬軒、吳康齋諸家，都還是沿襲着程朱理學的習氣，爲統治階級服務，以粉飾太平。後來又有陳白沙、湛甘泉等人，特別說出來：『靜中養出端倪。』與佛家的思想差不了多少。到了明朝中葉，出現王守仁所創立的陽明學派，倡導『知行合一之教』，所謂：『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。』又把宋儒所謂：『理』與『氣』合而爲一，闡述了人生氣質之性也是善的，從而提出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，還做了一篇『拔本塞源論』。陽明雖出身於統治階級，却曾與腐朽的宦官勢力作過鬥爭，是有其一定進步的意義。同時他又把宋元以來的性理學，分辯『理氣合而爲一』，主張氣質之性也是善的，在舊的性理學上也推進了一步。但是他所謂『實踐』，不是體現客觀規律的實踐，而是從內心精神省悟的修養，所謂：『天下無心外之物』，『意之所在便是物』，『心即理』，仍然屬於主觀唯心主義與客觀唯心主義的鬥爭。『過去程朱陸王的鬥爭，他們思想鬥爭的本質，原來是主觀唯心主義與客觀唯心主義的鬥爭。』說的是正確的。但是陽明學派有他的兩面性，內部也有其矛盾：有玄學唯心論的一方面；也有『知行合一』講求實際的一方面。他的樸實近理的主張，遂爲廣大農民羣衆所歡迎。他的學生王心齋把他的學說通俗化了，傳播到農民羣衆中去，所謂：『秋成農隙，聚徒講學，前歌後答，絃歌之聲，洋洋然也。』可是左派王學，顏山農、何心隱、李卓吾等人反對正統觀念，講求分辨真理和是